

导 论

一、近代化概念的界定

近代化一词在当今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然而，学术界对近代化涵义的理解和使用则有诸多歧异。

罗荣渠先生在他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著作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现代化”与“近代化”两个名词的含义与异同。罗先生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成就斐然，其精到的考释和对现代化涵义及关于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独到见解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他认为“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 *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意。*modern* 这个词作为表示时间概念的形容词，在普通英文词典里解作：*of the present or recent times*，意为“现世

(代)的”或“近世(代)的”。罗先生说,作为历史上使用的一个时间尺度,在西文里, modern times 一词大致是指从公元 1500 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他认为,在英文里(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俄文等也同样),“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他认为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一词的含义,即兼有上述两层意思。

罗先生又指出, modernization 译为日文,使用的汉字是“近代化”,日本史学界也一直把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称为“近代化”。他认为日本人使用“近代化”概念而不使用“现代化”概念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近代化”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也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如果我们采用“近代化”的概念,那么随之就要引出“现代化”的概念。罗先生说:“单纯地按时间先后来区分‘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不符合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的。”他认为,如果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理解“近代化”和“现代化”,现代化理论运用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时,会立即造成概念上的混乱:有些国家有“近代化”而无“现代化”,有些国家则有“现代化”而无“近代化”,有些国家既有“近代化”又有“现代化”,如此等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当然是不能允许的。所以,罗先生认为,不能因为史学界使用“近代化”的提法,我们也采用“近代化”的提法。^①

罗荣渠先生还指出,现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从工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 页。

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从狭义上说，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采取适合本国的道路和方式，通过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转变为先进工业国的发展过程。^① 罗先生根据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作出的广义与狭义现代化概念的阐释，无疑是确当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根据中国及许多亚洲国家社会发展的进程，似乎很难在近代化和现代化之间作出界定。他们认为，近代化和现代化之间还是有差异的，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

其一，近代化与现代化都是生产力革命，但近代化是超越古代手工劳动、农业自然经济；现代化则是超越近代机械化、工业化的生产力，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其二，近代化的特征是社会生产的机械化、工业化，主要变化表现在看得到摸得着的“硬件”方面；现代化则是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信息化、电子化、社会道德的全球化等，主要变化不仅表现在看得见的“硬件”方面，也表现在看不见的“软件”方面。其三，带头产业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近代化的带头产业首先是交通运输、能源动力工业、轻纺钢铁原材料、机械制造等，产业结构上突出基础工业；现代化的带头产业首先是科技产业、电子工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等。产业结构上突出的是高科技带头的第三产业。其四，生产方式上，工业近代化还是以粗放型为主，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科技含量十分有限；而工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生产的集约化程度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很高，经济增长因素中的科技含量占 60% ~ 70% 以上，不断节约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这是从经济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差异来考量两者之间的差异。他们认为，经济近代化实质上是以机械化、工业化代替手工劳动、农耕经济，造成近代生产力的大革命。经济近代化表现在农业方面，则是“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而经济现代化表现在工业方面则是以新的技术来改造原有的产业（如纺织业、食品业、机械制造业、冶金业、建筑业等），同时，建立起一系列新兴和高科技产业（如电子、石化、飞机制造、宇航等）；表现在农业方面，则是机械化、良种化、生物工程的应用等等。他们认为，从经济上去看近代化和现代化，它们之间有不可否认的区别，二者不能等同。近代化的完成为现代化的实现奠定基础，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以近代化作为前提。^①

当然，这是就经济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而言的。但是近代化和现代化不能仅限于经济范围，因为它是整个社会的变革过程。它与社会变革有关的政治民主化、社会的整合化、文化的大众化，以及人的素质的综合提高等又有何异同，学术界还未见到有关这方面的综合阐释。但我原则上认为，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概念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不能以英文动态名词 *modernization* 的涵义来界定近代化即现代化，更不能说世界上只有现代化而没有近代化。我们既然承认，近代化和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过程，它是社会变革的历史范畴，是根据世界变革的新认识

^① 参见王业兴 1996 年 6 月提交中山大学“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孙中山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模式的建构》，又见何科根主编：《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二），广东《学术研究》杂志社 1996 年版，第 41 ~ 56 页。

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就应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征，把这样一个发展时期按习惯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并无不可。

另外，由于各个地区或国家的情况不同，因而通过近代化的道路也不可能一样，每一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它必然要依据自己的国情来建构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具体的实施方案。正如《中国现代化史》的作者所说：“我们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在这里，‘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性概念。它与‘现代性’不同，它不是指后者所象征的那个静态的文明结构，而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第一、二次大转变是在各个地域或各个民族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下个别实现的。而第三次大转变的情形恰恰相反。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要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它在地球的某一区域首先突破，然后伴随着血与火强行扩散到世界的每一角落。历史也确实如此。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因为如此，现代化在历史上又被称之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来，它们可以是等值的，但和后面那些概念相比较，现代化也无疑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

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①

所以，所谓的“现代化”，无论如美国社会学家 M·列维所指出的“内源发展者”——“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英、美、法，或“后来者”——“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如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由农业文明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近代化与现代化指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它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发展和精神变化的问题。事实上，各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都表现出大量的特殊性，实现近现代化的模式和具体的实施方法和走向也不相同。近代化与工业化或“西化”是不同的，用“西化”来说明近代化，“可以说是用词不当”。^②但如果说中国近代史上的近代化就其追求的目标来说是资本主义化，我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也是资本主义化，那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因为现代化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把两种不同性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代化等同起来，不仅会在理论上造成混乱，而且在现实的实践中也会造成许多的困扰。所以，我们在使用近现代化的概念时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现在我们运用近现代化有关的理论和方法，从一个新的不同的角度来审察中国近代史时，一概拒斥和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无疑都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把一般近现代化的理论同中国具体的本质的特征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得出符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 1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3 页。

②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 页。

合中国历史事实的结论。旧中国虽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更没有成为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世界历史运动——近代化，在鸦片战争后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它是在慢慢地驱动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尽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它也在自觉或不自觉，甚至可以说已经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很显然，这个历史阶段的近代化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现代化，无论是就其前提条件、理论、内涵而言，还是具体的实施方法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把孙中山当年的近代化理论和方法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所提倡的现代化理论和方法混同起来，纯属牵强附会。

因此，我认为，近代化与现代化是一个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区分两个概念是非常必要的。章开沅、罗福惠先生在他们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中，为区别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现代化，把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现代化“叫做早期现代化，把后者称为现代化”。^①这也是一种区分，有这个区分比没有这个区分要好得多。我至今认为，把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称为“近代化”过程，从概念来看，是非常明确的。相反，把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称为“现代化”，不仅会使人误解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还会造成误解，好像凡是现代化都是依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去运行。很明显，把近代化等同于现代化，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阶段便缺乏具体内涵，从而现代化也就缺乏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不同特色。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 页。

所以，在历史研究中习惯的用法不是不可以用的。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刘广京先生主编了一部书，其书名原为“*Li Hung-Chang: Diplomat and Modernizer*”，译为中文为《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与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1993年3月纽约州阿曼克市M·E·夏普出版社出版此书时，刘先生将书名改为“*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可译为《李鸿章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在书的序言中，刘先生说：“如译为《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则似更达意。”1995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绛先生的译校本时，又将书名改为《李鸿章评传》，副题仍为“中国近代化的起始”。^①为什么由“中国近代化”改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最后又改为“中国近代化”？刘先生是华人学者，我相信他为中译本写序，是用中文书写的，不存在译者的误译。刘先生在这个中译本序中虽没有讲明更改书名的更多理由，但起码说明“中国近代化”一词在美国也有人使用。

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就近代化概念的界定和它所包涵的内容和特征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尽管“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报刊中使用，开始在中国流行，但“近代化”与“现代化”概念一直没有严格界定。罗荣渠先生指出：“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是‘现代化’这个概念被推广运用于中国的正式开端。”^②在70年

① [美] 刘广京、朱昌峻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中译本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 罗荣渠：《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思维演变的反思》，《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4页。

代以前，我国内地出版的大型工具书如《辞海》、“历史辞典”等虽既没有“近代化”，也没有“现代化”的词条，但从 80 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概念则被学术界同时使用。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近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它不仅仅是现代化这一持续至今的长过程中的一个具体发展阶段，或者简单地说，近代化就是各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过程”。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近代化就是早期工业化，而近代工业所体现的新兴生产力又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因此“近代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化”。^①也有学者认为，“工业化、民主化、革命化，是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主要内容”。^②在谈到现代化的涵义和特征时，有人把它概括为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上的整合化、文化上的大众化。还有人认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化，与工业化、民主化一起共同构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涵义”。^③又有学者指出：现代化“不是简单的工业化加民主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④台湾“中央研究院”组织编撰的一套从不同省份，实则是从若干省份考察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著作，将近代化解释为进一步走向社会平等化、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过程。

无论是近代化还是现代化，归根到底都是指从 1840 年至

①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3～224 页。

②刘天纯：《孙中山先生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66 页。

③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 页、第 7 页。

④章开沅：《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序言》，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 页。

1949 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而承担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化任务的主体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没有问题的。因此，近代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说得通的。所以，我们认为，以追求近代中国独立、民主、富强为目标的社会变革过程称为近代化过程，为实现现代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国防，以及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整合化、文化的大众化为核心的社会转型称为现代化过程，也未尝不可。把从 1840 年至 1949 年近代中国时期的社会转型称为现代化过程，显然有点不合常理，也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本书定名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而不称为《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研究》，便是基于上述考虑。

然而，中国近代化可以说是追求资本主义化，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西化”。因为世界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近代化在各地经历的道路和所用的方法也迥异。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近代化的过程开始于西欧，扩展于北美和欧洲其他地区，然后蔓延向亚非拉美。早期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属原生形态，那是一个内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过程，一般采取渐进的演变形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亚非拉美国家的近代化则大都属于诱发型，那是在西方冲击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时间短而集中，往往采取突变的即革命的方式。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属于后一类型。既然，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它是反映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所经过的巨变，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又必须采取突变的方式来争取实现近代化呢？这主要是封建主义反对中国近代化，帝国主义阻碍中国近代化。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而封建主义又是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中国的主要支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反对中国实现近代化，严重地阻滞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不采取强力的突变手段来改变中国的封建主义的统治，要实现中国的独立和民主，以及要实

现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就绝无可能。所以，正如孙中山晚年在一次讲话中所谈到的，“今天我们要来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来救中国。拿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个就是所谓三民主义”^①来救中国。据此，我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实业化”是近代化的中心，民主政治是促进近代化的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和发展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近代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崭新中国”。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化变革的任务在旧中国没有完成，然而，“1911 年秋爆发的辛亥革命，导致了封建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制度的建立。这既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启蒙，也促进了实业化的进展”，辛亥革命“作为近代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步伐，先进政权的杠杆作用得到初步的显示”。^②

二、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近代化（亦称‘现代化’）研究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以后在西方社会学术研究中逐渐兴起的边缘学科。它作为发展社会学的分支，随着现代工业国在经济上的重大发展，成为联合国瞩目和西方学者关注的课题之一。这一重大的研究课题并非首

^①孙中山：《应上海〈中国晚报〉所作的留声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37 页。

^②张磊：《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胡春惠主编：《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 1994 年版，第 122 页

先由历史学家提出，而是首先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提出来的。“政治学家从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的角度探索政治现代化过程，社会学家从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研究现代社会的变迁，而历史学家则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具有世界性历史演变过程。”^① 近代化研究，一时新说迭起，成为西方社会学术研究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关于近现代化的理论，在已有的论著中如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章开沅、罗福惠先生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等书，都已有相当精审的推介和评述，这里就不赘述。

论及中国的近代化研究，虽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才成为研究的热点，但作为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则从 19 世纪 60 年代便开始了。近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人民已经追求了一个半世纪。人们都认为，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无疑洋务派以“自强”的名义兴办了军事工业后又扩展到民用工业，它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是一种竞争力量。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有其积极意义，但由于洋务运动是在维护旧制度的动机下发动起来的，所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与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要求背道而驰，它“是一种十分不情愿但又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勉强做出的反应”。^② 由此注定中国的近代化起步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31 页。

② 郑继兵、杨仑：《艰难的历程——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追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 页。

十分迟缓而取得的成效也极其低微，同时也注定了中国以后的近代化追求过程的艰难曲折。

自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后，中国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士大夫们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尤其是关注东方的日本。他们经过反思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强不仅仅是军事装备的精良，中国的弱也不仅仅是由于武器装备不如人，而是由于政治不良，工商业不发达，而这主要的原因又是由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人口的膨胀、帝国主义的掠夺。因此，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就必须要从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开始。所以有后来先维新改良还是先反清革命的论战，及学英国的君主立宪还是学美国的民主共和之争。这些争论无疑涉及到中国近代化的核心问题，但是直至辛亥革命失败，“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从学理上去探寻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学者和论著还极其有限。

从近代化的理论框架来看，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振兴中华而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可统称为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运动。学术界探讨近百年来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演变与社会变迁的论著汗牛充栋，取得巨大的成就。但谈到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模式时，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或“全盘西化”，而对其发展演变的曲折过程，即如何由“中体西用”到“西化”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脉络，把它联络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索来研究，仍不尽人意。

罗荣渠先生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一书，为研究“五四”以来近代化思想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该书选编了 1919 ~ 1949 年间我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

化观、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化出路问题、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问题等几次大论战的有关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专题汇编，为我们了解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认识的艰难历程提供了方便。

对于东西文化观：东方化还是西方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人们对上述问题都有过相当规模的讨论，尤其是从 30 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讨论还相当有水平，它涉及到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现代化的前提与方式，现代化的农业与工业等经济问题，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与民族运动的关系等原则问题。可见，近现代化的理论问题、模式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开辟的领域，只不过是由于民族战争和内战破坏了中国安定的建设环境才把上述问题搁置起来了。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重新在我国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化研究热潮，是 20 世纪 30~40 年代我国近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继续和发展。这次研究热潮的规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而且还牵涉到海峡两岸中国学者和外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学科，并取得空前的研究成果。

开始于 1973 年 8 月，结束于 1977 年 1 月，由李国祁、张朋园两位先生主持的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 10 多位学者就“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课题进行了多年的集体研究。这个研究分沿江沿海及内陆地区两大部分，用现代化的理论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他们分别研究沿江沿海的都市、省区和内陆有关省份现代化的背景，外力冲击及其相关问题，以及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等有关问题，并陆

续出版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甫告结束之际，为了对现代化理论和研究成果作综合检讨与评估，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又于 1990 年 8 月 16 日至 18 日，在台北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与会者 140 人，提交论文 27 篇，内容涉及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中的个人态度与社会因素、传统与现代化的联系、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国家与社会，以及不同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比较等众多问题，并于 1991 年 3 月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中国现代化论文集》。

在中国内地，随着 70 年代末期起国家全力转向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发展轨道之后，一直中断了几十年的现代化课题又重新成为热门课题。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短短十来年间，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丛书，如《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国外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人的文化素质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传统与变革、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等大批论著，仅是从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的十数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出版社便出版了数十种有关现代化的著作，无论在观点、方法方面，还是在内容、史料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突破，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对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首次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并以此论证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总趋势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并对近百年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启蒙思想演变过程作了专题考察。全书运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熔理论与历史研究为一炉，突破了传统与西方研究成果的窠臼，阐发了许多精辟见解。此书关于现代化的新见解为中国学术界探索现代世界发展进程和中国现代化道路拓展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把中国早期现代化置于世界发展的宏观进程中加以考察，在进行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回顾和探讨之后，采取纵向回顾与多方面的横向剖析相结合，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与历史经验，并与有关国家作总体或局部的比较，从而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深化了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此书具有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的明显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的出版，传递了西方权威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新信息。这是由 9 位社会学、国际问题、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的专家，从 1974 年 12 月开始酝酿至 1980 年付梓问世，前后整整历经 6 个年头才撰写而成的巨著，是迄今为止国外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最系统的专著。它从晚清中国与西方交手并着手现代化说起，一直写到 1978 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和科技进步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在晚清、民国初期、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的起步、彷徨、动摇、发展、挫折、再发展的艰难历程。该书从讨论何谓现代化开始，就中国现代化的长过程、现代化的多层面性、现代化的比较领域，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阻

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指出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都是国内社会转型。所以，后现代化国家必须通过广泛地向前现代化国家借鉴，才能增强自身传统体制的适应性。作者还根据自己的体察指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殖民统治的影响是重要的，但也是有限的”；殖民统治对中国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① 该书观点见仁见智，但它毕竟是一部由外国人撰写，从学者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和借鉴。

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则有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该书由中青年学者分头就各自熟悉的专题进行研究和撰写合编而成，1995年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叙事的时限从1800年至1949年，它虽按时间顺序叙述史事，但基本上是块状形的组合。其总论就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类型与反应性质、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主题与运作背景、政治变迁中权力聚散的历史循环、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分层与现代化动力群体、文化危机与思想冲突等理论问题作详细而又系统的描述和介绍。从此书的体系来看，它虽是从社会史的视角去把握中国的现代化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但明显是着重从理论的范畴去寻找“中国历史终于摆脱了治乱相替千年循环的怪圈的缠绕，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指向”的根由。该书共分22章，但章与章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第一章是讲“巨变前的社会经济景观”，第二章讲“新思潮的萌动”，而第三章则讲“危机中的政治嬗变”，可是第四章则讲“中国工业化的发轫”，接着第五章则讲“士大夫的流产变革”，如此等等，说明本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